

近代中国大规模的国际迁移：1840—1949

朱 国 宏

【内容摘要】 全球3700多万海外华人群体的形成，与中国历史上长期持续的国际迁移历程分不开，特别是与近代大规模的国际迁移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从历史人口学的角度对1840—1949年间中国国际迁移的形成原因、演变过程、移民规模和流向分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提供了近代中国大规模海外移民的历史场景。

【作者简介】 朱国宏，1963年生，现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教授。邮编200433。

据估算，目前全球的海外华人(Overseas Chinese)总数多达3700余万人，广泛分布于世界上136个国家或地区(Poston, et. al., 1994)。从国际迁移的角度看，在这一规模庞大的海外华人群体中，只有一小部分属于直接的国际迁移者，而其余的绝大部分是国际迁移者的后裔，即华裔。当然，华裔群体的形成也是与国际迁移相联系的，那就是，历史上的国际迁移过程导致了今日庞大的华裔群体的形成。而中国历史上的国际迁移过程，虽然发端甚早，最早可追溯至秦汉时期(朱国宏，1989)，但是，大规模的国际迁移却主要发生于近代。本文的目的在于，从历史人口学的角度对1840—1949年间中国发生的大规模的国际迁移现象作一探讨。

1 近代中国大规模国际迁移形成的原因

1.1 “推力”。迁出的推力主要来自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1840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停滞，国力衰弱，特别是两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经济元气大伤，危害最烈的莫过于沿海地区，特别是作为最主要迁出地的广东省。而沿海地区，由于入清以来的人口不断增长，社会经济发展早已处在庞大的人口压力之下，人口压力之下的土地兼并日益严重，逐渐游离出大批过剩的劳动者。大批过剩的劳动者沦为无产者，加上战争的影响，使得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近代以来的“天地会起义”、“小刀会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正是发生于这种情势之下。所以，近代中国不仅具备迁移“推力”，而且可以说“推力”是十分强劲的。

1.2 “拉力”。拉力主要来自迁入国，而迁入国又大都是当时西方列强的海外殖民地。开拓殖民地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往往不是当地所能提供的。譬如，西方殖民者进入东南亚后，开垦种植园需要大批劳工，但当地由于人口稀少，不可能满足这种需求，因而，需求的目标也就逐渐集中在地理上邻近、人口众多、劳动力廉价的中国。因而，对中国劳动力的迁移拉力也同样十分强劲。

1.3 迁移中介。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之下，迁移的发生取决于是否具备迁移的中介条件，这种条件包括交通条件、政策条件、组织条件等。交通条件在近代以前很早就具备了，因为中



30017036K

国的海船早在唐宋时期就能抵达东南亚以外的海域, 元明时期更是“海上独步”, 所以, 迁移的交通条件是具备的。政策上, 在明末清初中国政府是厉行“海禁”的, 不许人口外迁。但是, 这种“海禁”时紧时松, 并不能彻底限制外迁, 而在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 这种“海禁”政策也就形同虚设了, 甚至在西方殖民者压力之下不得不发令“甘愿出洋者, 不得阻其外出”。至于迁入国的政策, 由于控制在西方殖民者手中, 自然也没有问题。组织条件, 这里指迁移行为的组织者, 这种组织者是由西方殖民者扮演的, 在早期, 还有堂而皇之的招募形式, 但很快就演化为“苦力贸易”。清政府的软弱, 又使这种惨无人道的“苦力贸易”合法化, 直至清朝崩溃。此外, 在迁出、迁入两地形成迁移流程之后, 惯性的力量也促使着人口自发外迁或回迁。这在 1911—1949 年间是十分常见的。

1.4 迁移者。具备迁移条件的迁移者一般是青壮年男性, 而对于主要迁出地闽粤两省来说, 迁移者特征还包括经济上的赤贫者、社会上的底层劳动者。当然, 在“苦力贸易”中被诱拐强掠的还有其他类型的劳动力。

近代中国之所以形成大规模的国际迁移现象, 是因为不仅具备这四个条件, 而且每个条件都十分充分, 特别是由于西方殖民者的操纵, 形成了强大的助动力, 使国际迁移不仅源源不断, 而且流量巨大。

2 近代中国国际迁移的演变过程

近代以来的中国国际迁移大致可划分为两个时期, 从 1840 年到清王朝崩溃的 1911 年为契约移民时期, 从 1911 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 1949 年为自由移民时期。前一时期以“苦力贸易”为特征, 后一时期则受国内外政治社会经济形势的影响, 时断时续, 外迁过程中伴有大量的回迁(朱国宏, 1994)。

契约移民时期经历了“苦力贸易”的兴起、高潮和衰落三个阶段。“苦力贸易”兴起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 较早以招募契约华工为形式的“苦力贸易”发生于厦门, 由英国商人德滴(Tait)于 1846 年到厦门设立西班牙领事馆, 同时开办德记洋行, 该洋行专门从事“苦力贸易”。以后, 英商、美商相继到厦门建立洋行, 从事“苦力贸易”活动。1852 年发生美国苦力船罗伯特·包恩号华工暴动事件后, “苦力贸易”中心转移到汕头。1852 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年间约有 4 万华工从汕头被贩运到各殖民地。其后, “苦力贸易”中心转移到广州, “苦力贸易”彻底合法化, 香港、广州、汕头、澳门、厦门等地形成“苦力贸易”网络。据不完全统计, 1864—1873 年间由澳门贩运出国的契约华工多达 14.77 万人, 而澳门的“苦力贸易”点(“猪仔馆”)也增加到 300 余个。至此, “苦力贸易”达到高潮。1874 年开始, 由于“苦力贸易”的惨无人道和契约华工在殖民地备受虐待, 引起了社会公愤, “苦力贸易”受到限制, 逐渐走向衰落。1911 年清王朝崩溃, 次年中华民国建立, 孙中山颁发《大总统令外交部妥筹禁绝贩卖猪仔及保护华侨办法文》和《大总统令广东都督严行禁止贩卖猪仔文》, “苦力贸易”逐渐式微, 并开始进入自由移民时期。

自由移民是相对于契约移民而言的。在这一时期, 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辛亥革命到大萧条, 即 1911—1929 年间, 这一时期与中国的国内战乱和世界第一次大战相联系。外迁持续, 流向转向欧洲、俄国等地。在 1916—1918 年间, 由惠民公司招募的赴欧契约华工达 3 万多人。这时开始出现留学迁移。在辛亥革命期间曾出现回迁现象, 主要是华侨回国参加革命。第二阶段从 1929 年到 1941 年, 中国经历了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 世界则是全

球性经济大萧条。这一时期外迁减少,回迁大为增加。1931年回迁华侨有28万,而外迁仅为14—15万;1932年回迁达27万,而外迁仅为13.2万。1930—1934年间,据厦门、汕头、琼州三口岸统计,回迁与外迁之差达35.4万人。1935年以后,外迁开始超过回迁。1935—1937年间,由厦门外迁的移民每年达6万人。第三阶段,1941—1949年间,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世界则经历了第二次大战和从大同盟到冷战。大战期间迁移中止。大战后外迁增加,并伴有回迁。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迁基本停滞。

3 近代中国国际迁移的规模估计

近代以来是中国大规模的国际迁移时期,但是,对于期间究竟有多少中国人外迁问题,学术界有不同估计,这些估计往往人言人殊,口径大小颇为悬殊。譬如,朱杰勤估计,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被拐骗出洋作苦工的中国人约有百万人(朱杰勤,1987);而陈翰笙则认为,在18—20世纪间,从中国贩运到海外的“猪仔”不少于六、七百万人(陈翰笙,1979)。显然的是,二者的估计相距甚远。这里,综合多种资料,对近代迁移规模问题作一估计。

对近代中国国际迁移规模进行估计的困难在于,在迁出国,中国没有相应的移民统计,不可能提供历年外迁人数的准确资料。而在迁入国,对于有些统计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能够得到相对准确的中国移民入境数字,而对于更多的迁入国来说,不可能提供相应的资料。陈泽宪曾根据国外有关当局公布的中国移民和契约华工入境数字,结合中国海关历年贸易年册内的移民出国数字和有关著作的材料,对1801—1925年间的中国外迁移民数作了较为细致的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中国国际迁移的规模: 1801—1925

单位: 万人

时 间	1801—50	1851—75	1875—1900	1901—25	1801—1925
人 数	32	128	75	65	300

资料来源: 陈泽宪, “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 载历史研究, 1963: 1

首先应当指出, 陈泽宪的上述估计是有依据的, 因而比诸一般的估计更为可信。问题是, 这一估计是否就是近代以来的总数。从时间上说, 前表包含了1840年以前40年的历史, 同时没有统计1925年以后24年的数字, 因而不能笼而统之作为近代移民总数。即使是就所统计时期而言, 上述的估计数与其说是一个确数, 不如说是一个估计基数, 亦即, 在资料可得范围内的统计数, 实际数字当大于上述的300万估计数。其理由是, 上述数字所依据国外有关当局统计, 如前述, 对有些国家是准确可靠的, 而对于更多的其余国家则未必可靠, 甚至根本就没有统计数字; 同样, 上述数字所依据的海关贸易年册所代表的是官方的统计, 而官方统计一般只记录登记在册的移民数, 对于“非法移民”鞭长莫及, 而这种“非法移民”在近代的“苦力贸易”中恰恰是最重要的, 因而缺漏在所难免。因此, 可以认为, 陈泽宪的估计提供一个近代移民规模的估计基数, 即下限。至于实际规模, 则应参照其他资料进行估计。

从其他的资料来源中, 我们不难反证陈泽宪估计数的“保守”。譬如, 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提供的统计数字表明, 1881—1930年间, 经由新加坡转运到其他地方的“苦力”就有500万之多, 远远超过陈泽宪的估计数。不仅如此, 加上非转运的部分, 同期进入海峡殖民地的中国移民总数多达830万人(彭加礼, 1980)。又如, 据统计, 在1918—1931年间, 仅从汕头、香港出境的海外移民就有380万之多(陈翰笙, 1984); 1904—1926年间由福建迁往马来西亚的平均每年有5万人, 总数达110万人; 1910—1926年间由福建迁往印度尼西亚的平均

每年 1.5 万人, 总数有 33 万人; 20 年代由厦门迁出的移民平均每年不下 10 万人, 总数也有近 100 万人; 1935—1937 年间由厦门迁出的移民平均每年 6 万人, 总数为 18 万人 (庄为玑, 1958)。再如, 1906—1910 年间由山东、河北、东北各省到沙俄地区去的华工总数达 55 万人 (田方、陈发棠, 1986)。

再从一些迁入国看, 据统计, 1918—1931 年间, 平均每年迁入泰国的中国移民有 9.5 万人, 总数达 133 万人; 1932—1945 年间, 平均每年有 3.38 万人, 总数为 47 万人; 1946—1955 年间, 平均每年有 2.68 万人, 总数为 27 万人 (郭梁, 1989)。也就是说, 1918—1955 年间, 仅迁入泰国一地的中国移民就多达 200 多万人。又据统计, 迁入新加坡的中国移民仅 1937 年一年就多达 40 余万人 (庄为玑, 1958)。

可见, 近代中国国际迁移的规模远不止于 300 万人。笔者估计, 在 1840—1911 年契约移民期间, 中国外迁移民总数达 1000 万人; 而在 1912—1949 年自由移民期间, 外迁移民数不低于 600 万人。也就是说, 近代以来中国国际迁移的总规模在 1600 万人左右 (朱国宏, 1994)。

4 近代中国国际迁移的流向和分布

近代中国国际迁移流的形成集中于沿海地区, 而沿海地区中又相对集中于闽粤两省, 闽粤两省外迁移民占移民总数的 90% 以上。而在闽粤两省中, 又以广东省为多, 约占 2/3。因此, 国际迁移的流向主要从闽粤两省流向诸迁入国。

迁入国的分布十分广泛, 几乎遍及亚、非、欧、美和大洋洲, 其中, 又以亚洲为主, 约占中国移民总数 90%, 其次是北美和拉美, 约占 8%, 其余广泛分布于非洲、欧洲和大洋洲。在亚洲, 又以东南亚为最多, 占亚洲总数的 90% 以上, 其次是东亚, 最后是南亚。在东南亚, 流量比较集中的国家有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缅甸、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在北美地区, 主要迁入国是美国和加拿大; 在拉美地区主要是秘鲁和古巴; 在非洲主要是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和南非; 在欧洲主要是英国和法国, 还有苏俄。当然, 在不同历史时期这种流向分布不尽相同, 表 2 是对不同时期流向分布的估计。

表 2 近代中国国际迁移的流向和分布

时间	1801—1850 年							1851—1875 年									
流向	东南亚地区	古巴	秘鲁	澳大利亚	美国	西印度群岛	其它	西印度群岛	英属圭亚那	古巴	秘鲁	南美巴拿马	美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夏威夷群岛	菲律宾
流量 (万人)	20	1.7	1	1	1.8	1.5	5	3	2	13.5	11	2.5	16	5.5	0.5	2.5	4.5
分布 (%)	62.50	5.31	3.12	3.12	5.63	4.69	15.63	2.34	1.56	10.55	8.60	1.95	12.50	4.30	0.39	1.95	3.52
时间	1851—1875 年				1876—1900 年						1901—1925 年						
流向	马来半岛	东印度群岛	加拿大	其它	美国	夏威夷群岛	马来半岛	东印度群岛	澳大利亚	加拿大	菲律宾	其它	南非德兰士瓦	欧洲、英国和北非	马来半岛	东印度群岛	其它
流量 (万人)	35	25	3	4	1.2	0.5	36	38	0.8	0.4	2	2.1	5.5	15	12.5	30	2
分布 (%)	27.34	19.53	2.34	3.13	1.60	0.66	48	42.67	1.07	0.53	2.67	2.8	8.46	23.08	19.23	46.15	3.08

资料来源: 根据陈泽宪“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前引文) 编制。

应当说明的是，表 2 中的流量系陈宪泽估计数，如前述，概系估计基数而非确数，本表意图在于说明这一基数下的流向和分布情况。由表 2 中可见，不同时期的流向有所不同，分布状况也是变化的。如美国，在 1900 年以前是重要的迁入国，但在 1882 年美国实行“排华法案”之后，入迁骤减以至于停滞。澳大利亚的情况相似。又如，欧洲在 1900 年以前很少有中国移民流入，而此后则成为重要迁入地。然而，不论流向如何变化，有一点是始终一致的，那就是，东南亚地区一直是中国移民的主要迁入地，约占总流量的 2/3，最多时占 90% 以上。

如果将流向分布与迁出地联系起来，那么，不同迁出地的移民流向分布也不一样。一般而言，同一迁出地的移民多迁往同一迁入地。譬如，原籍广东珠江三角洲和潭江流域的移民大多迁往美国、加拿大、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原籍广东潮州地区的移民大多迁往泰国、越南、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原籍广东兴梅客家地区的移民主要迁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原籍海南的移民主要迁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和越南，原籍福建晋江的移民主要迁往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新马，原籍福建莆田的移民主要迁往新马和印尼，原籍福建龙溪的移民主要迁往印尼、菲律宾和新马，原籍福建厦门的移民主要迁往菲律宾、新马、印尼和缅甸。这样，使得在迁入地形成了不同的籍贯构成。以东南亚地区为例，移民陆续迁入后所形成的华人社会，其籍贯构成如表 3 所示。

表 3 东南亚国家华人的籍贯构成

构成	福建帮	广府帮	潮州帮	客家帮帮	海南帮	其它
泰国	10	8	60	10	10	2
马来西亚	30	26	11	22	9.5	5.5
新加坡	40	18	23	1		18
印度尼西亚	55	15	10	20		
菲律宾	80	20				
南越	8	41	37	11	3	
柬埔寨	6	15	67	5	7	
缅甸	50					50

注：马来西亚合计数超过 100%，原表如此。

资料来源：源自黄天爵，华侨经济问题一，1963，转引自（日）李国卿，华侨资本的形成和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20

同一迁出地的移民在迁入地形成了帮派，也就以帮派相区分，而不以省（县）籍来区别，这种帮派的形成大多与其原籍的方言区域有关。如表 3 中的福建帮代表了闽南方言区的移民，包括厦门、漳州、泉州等地；广府帮代表广州话方言区，主要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潮州帮代表潮州话方言区，主要是潮汕地区；客家帮代表客家话方言区，主要是闽粤赣三省交接的客家人聚居地。“其它”中包括福建的非闽南方言区，如福州、莆田，广东的其它地区，以及广西、云南等地。

5 结论

近代中国之所以形成大规模的国际迁移现象，从国际迁移的角度看，主要是具备了国际迁移所需的四个基本条件，即迁移的“推力”、“拉力”、中介条件和迁移者，同时，加进了西方殖民者的强力推动，通过“苦力贸易”活动使大批中国人口源源外迁。整个近代移民史大致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晚清时期是以“苦力贸易”为特征的契约移民，民国时期则表现为时断时续的自由移民。在前一时期，中国外迁人口达 1000 万左右，而后一时期也有 600 万之多，二者合计，近代共有 1600 万中国人迁移海外。规模庞大的中国移民在海外的分布十分广泛，遍及亚、美、非、欧及大洋洲各大洲，同时又相对集中于东南亚地区。这种流向分布特

征决定了今天海外华人全球分布的格局，同时也决定了其之于不同国家不同的影响程度。

主要参考文献：

- 1 陈达. 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 商务印书馆, 1939
- 2 陈翰笙.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1—10). 中华书局, 1980—1985
- 3 陈翰笙. ‘猪仔’出洋. 百科知识, 1979; 5
- 4 陈泽宪. 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 历史研究, 1963; 1
- 5 郭梁. 华侨出国史. 郑民, 梁初鸣. 华侨华人研究集(一). 海洋出版社, 1989
- 6 李国卿. 华侨资本的形成和发展.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6
- 7 彭加礼. 19世纪开发西方殖民地的华工. 世界历史, 1980; 1
- 8 田方, 陈发棠. 国际人口迁移. 知识出版社, 1986
- 9 庄为玘. 福建晋江专区华侨史调查的几个问题.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集刊, 1958
- 10 朱杰勤. 东南亚华侨史.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
- 11 朱国宏. 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之历史考察. 历史研究, 1989; 6
- 12 朱国宏. 中国的海外移民——一项国际迁移的历史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4
- 13 Campbell, P. C.. Chinese Coolie Emigration to Countries within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P. S. King and Son, Ltd. 1923
- 14 Mei, J.. Socioeconomic Origins of Emigration: Guangdong to California, 1850—1882, Modern China, 1979; 5: 463—501.
- 15 Poston, D. L., Jr et. al.,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Around 1990.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94; Vol. 20 (3)
- 16 Purcell, V.: The Chinese in Malay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17 Zo, K. Y. Chinese Emigration into the United States, 1850—1880. New York: Arno Press, 1978

(责任编辑: 穆光宗 收稿日期: 1996—10)

Large Scal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Modern China: 1840—1949

The emerged group of 37 million overseas Chinese has been a result of a continued long-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particularly the large scal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ccurred in modern times. With a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demography, this article has examined the causes, evolution, volume, and stream distrib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ccurred in 1840—1949 in China, presenting a historical scene of the large scale Chinese overseas 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Zhu Guohong, Born in 1963, is Ph. D. and Professor and Deputy Direct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Fudan University.